



房山琉璃河遗址 北京地区纳入中原文明治理体系的实证

西周初期周王分封燕国,使北京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开始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见证这一关键转变的考古发现便是西周燕国始封地——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也是发掘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发掘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 郭京宁



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

城址:彰显中国早期营城建都理念

以往已发现城址的一重城圈,包括北城墙、东西城墙北段及部分护城河。有学者曾认为该城应有外城,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考古证据。经过近年考古工作,在内城的北侧、东侧发现另一道城壕,与内城城墙和护城河的方向几乎一致。根据外城壕的位置和长度估算,城址规模可由原来的60万平方米扩展至100万平方米以上。

外城壕内有堆积10余层,表明其形成的过程十分频繁。壕内还有牛坑及整羊、猪、狗等。这些现象应与周人的祭祀行为有关。各类证据都指向:外城壕的使用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期前废弃。这是对城址年代的新认识。

外城墙位于外城壕南侧、内城墙以北。它的发现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圈结构,突破了学界以往对琉璃河遗址城市格局、规划设计的认知。可以确认:西周燕都的城圈结构并非一重,而是至少存在两重。内外城之间发现了原始瓷片、仿铜陶簋残片、卜骨等高等级遗物,说明内外城之间还应存在重要遗迹。

琉璃河内城外郭的布局反映了中国早期营城建都的理念,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与中心都邑周原遗址相似,印证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广封诸侯,以藩屏周”这一重要史实,是北京地区作为早期诸侯国政治中心的直接证明,是分封制下中央政府进行边疆治理的有力见证。

夯土:揭示高等级建筑群规模结构

内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可分为三期。最早的一期为黄色生土夯筑,分块夯筑明显,为集束木棍所夯。第二期可能是扩建行为,为青色黏土与黄色生土交替夯筑,前者可能来源于挖掘水井所获得的生土,证明了大型建筑与周边水井的营建是同时的。最晚的一期夯土版筑现象不明显,夯土包含大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质量明显下降,出土最晚陶片年代为西周中晚期。

建筑基址的正南方和东北方各有一大型井,井深逾10米。井外土坑内的夯土范围近圆形,规模巨大。井口周边有大小鹅卵石铺就的铺石面。井口外东北有柱础;西南有可能为道路包边的南北向立石带;东南有一水池,池底池壁铺有整齐的大块鹅卵石。这些都表明应该有配套的井亭、水池、小路等设施。

大型水井是城市布局中的重要组成要素,与大型建筑共同设计、同时使用。这样的水井在内城内共发现10口,夯土直径均在前所未见的15米以上。它们在城内分散分布,间隔150~250米,可能是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为探索西周城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成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揭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不仅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内布局结构,更为研究西周封国都城的城内构成要素提供了关键材料。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周代城市分布格局整齐,近似于方形或者长方形,以宫为中心形成分区结构营建聚集封闭

型城邑。琉璃河作为西周诸侯国都城和燕国始封地,宫城区居中并成为全城核心的设计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墓葬:探索西周基层社会组织结构

新发现带墓道大型墓葬,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大型墓葬的形制和排列方式与其他西周封国大型墓葬一致,表明遵循固定礼制下的葬制与葬俗。

墓中青铜器克盃和克罍上的铭文“王曰太保……令克侯于匭……”,证明了琉璃河燕国都城的出现是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标志着北京地区出现了以周王朝为代表的新的政治势力和文化面貌,成为中国古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的直接物证。作册奭器上的“太保彔燕”铭文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实证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太保召公奭亲自来到燕地,并在此建都,证明了燕国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彰显了燕国在西周早期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贵族墓,平民墓葬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场景。城北发掘的西周中期小型平民墓地,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绝大多数为成年个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多为单鬲或鬲、簋、罐的陶器组合。部分墓葬在腰坑内或在填土中殉狗,有随葬动物左前腿的现象,具有较为浓厚的商文化因素。该片墓地墓主人骨骼的碳氮同位素比值较黄土坡贵族墓葬区显著偏低,与其平民身份相符。

器物:展现多元一体文化交融格局。琉璃河遗址整体体现了以周文化为基底的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在墓葬内涵上,可以明确反映出周文化中以青铜器列鼎制度为代表的礼乐文明,这种分邦建土的行为是早期国家治理的体现。

来自周边的文化辐辏形成了琉璃河遗址多元汇聚的气象。陶器中的姬周文化、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共存。青铜器中的车马器、镂空剑鞘、镞头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风格,青铜簋等礼器具有中原地区的风格,镂空三角援戈、矛等具有峡江地区的风格,人面形錫等具有本地的文化风格。

显示阶层分化的用玉制度、甲骨文骨刻技术等无不与中原如出一辙。其背后是思想观念的认同和被纳入统一治理体系的表现。《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于是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依次受封”。这段文字表明燕国已融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分封制与宗法制,如同西周统治理念的两块基石,使西周走向强盛,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学习时报》

油漆大王陈调甫的抗战故事

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民族化工先驱陈调甫以“实业救国”的坚定信念在化工领域谱写了壮丽篇章。他参与创建亚洲著名的天津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铔厂,后独力创办天津永明漆厂,成为我国涂料业的泰斗。

出身于苏州书香门第的陈调甫,1912年入东吴大学化学系学习,5年后获得化学硕士学位,成为国内培养的首批硕士毕业生。1917年冬,他北上天津,与范旭东等一道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历经8年艰苦奋斗,突破外国技术封锁,1920年生产出的“红三角”牌纯碱在万国博览会斩获金奖,打破“洋碱”垄断,奠定民族工业根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陈调甫一方面艰难维持生产,将涂料制品低价廉售供抗战军用,另一方面奔走在津沪港渝之间,筹划将漆厂内迁,但因拒绝行贿走门路,迁厂计划失败了。

为避免日伪强迫“合作”,陈调甫将天津的漆厂业务全面收缩,委托王绍先等惨淡经营,维持工厂一班人的生计,自己则避居到上海,成立了永明试验室和万化制药厂。战争期间药品奇缺,他招聘一些工人生产销售磺胺类的消炎药,同时进行涂料新品种的研究,特别是对用醇酸树脂为原料生产的油漆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从而为永明漆厂日后另一名牌产品“三宝漆”的问世打下了基础。他本人曾回忆:“抗战后天津受敌方严密监视,研究化学机关易遭干涉。仪器药品购置更难。是时太平洋战事未发,上海(租界)成半自由区,研究材料甚为丰富,遂决定设立研究院于上海。延揽人才,搜罗仪器书籍,在兵荒马乱之时,建一小小讲学格物之地。服务人员,研究略有心得后,潜赴后方以效力国家者,颇不乏人,亦算抗战期间一点贡献。”

天津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日军重点控制的目标。永明油漆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工厂可能被日军占领,技术人员可能被强征,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可能毁于一旦。陈调甫时刻关注留守在天津的永明漆厂和职工们的状况,一直保持书信往来,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曾说:“人家囤货为自己发财,我囤货为国家储才。”当时,永明漆厂依靠代理人王绍先、梁兆熊等勉强维持,他们按照陈调甫的指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低调运营,回避与日方合作,日方屡次威逼利诱不成,以军需为名将永明漆厂存放在中国银行仓库的贵重原料全部劫走,价值等于半个工厂,永明漆厂被迫停产,仅依靠生产化学试剂和经营商行职工们发放工资,在艰苦的环境下保存住了永明的人才实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调甫从上海把所有的图书、仪器及大批原料运回天津,着手恢复永明漆厂,得益于技术和人才储备的良好基础,漆厂的发展顺利且快速。1952年,永明漆厂的油漆产量已跃居中国首位,研制出能喷、能刷、能烘烤的中国第一代醇酸树脂漆——“三宝漆”,不仅质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还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商标“灯塔牌”。三宝漆能喷、能刷、能烘烤的特性使其成为新中国工业标识,应用于第一辆红旗轿车、长江大桥、人造卫星等重大项目。

1950年9月,陈调甫加入民建。他衷心拥护新中国、热爱民建,还坚持深耕科研创新,持续关注教育事业。1956年以后,陈调甫患心脏病。但他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要多写书,留给后人”的嘱托,仍努力工作,着手编著《油漆词典》。临终时,手稿上“做学教”的批注墨迹未干,诠释了“中兴业,须人杰”的毕生追求。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作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陈调甫不仅在化工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在抗日战争这一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和担当,在战火纷飞中守护民族工业的火种,为国家储备了一批宝贵的化工人才,为战后中国化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博璠 据《人民政协报》